韦政通文集　论人之卷

时代人物各风流

韦政通　著

何卓恩　王立新　编

中华书局



1958 年于台中东海大学牟宗三先生家门前



1968 年 5 月 4 日,作者与殷海光合影于新竹青草湖



1982 年 7 月朱熹会议期间，作者与哈佛大学教授史华慈（左）、英国汉学家葛里汉（右）合影于夏威夷风景区



1982 年 7 月在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前排左起：冒怀辛，赵玲玲，高明，罗光，邱汉生，任继愈，余英时，成中英，张立文；后排左起：姜允明，邓艾民，曾春海，黄俊杰，蔡仁厚，韦政通，秦家懿 ，傅伟勋



1987 年作者与傅伟勋合影于新竹南园(联合报休假中心)



1988 年 5 月,作者到北京协和医院探望病中的梁漱溟先生



1990 年 5 月,作者在河北石家庄“晏阳初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言



1992 年 6 月陈荣捷院士最后一次离开台湾时，作者于机场送行



2005 年 5 月，作者与本书编者何卓恩教授（左）、王立新教授（右）合影于其故乡镇江金山寺



韦政通（左二）出席“胡适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

不熄的理想火焰

——写在“韦政通文集”出版之际

歌德曾说,“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个高尚的智者在交谈”。陈列在你面前的这部文集,就是当代中国(台湾地区)著名学者、知识分子、思想家韦政通先生以毕生心力和热情,曲折探索和思考的结晶之一,是一部娓娓道来的传统与现代相交响、作者与读者相共鸣的好书。

自从西风东渐以来,社会转型的历史课题即在中国出现。围绕是否需要转型,采取何种路径转型,向哪个方向转型等亟需解决的大问题,相继出现几个思想高峰。一是维新时代的“新旧”之思(围绕变与不变、小变与大变而展开的思考与争论),一是革命时代的“主义”之思(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之间的思想取舍),一是战后和平年代的“现代化”之思(致力于传统与现代的连接,个人、社会、国家价值的均衡)。韦政通先生的思想,是以现代化为中心来展开的。

先生致思的时代,变革已成为共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论调,不再能激起社会的涟漪;“主义”之争由于半个世纪理与势的竞争也已渐成定局,有略显过时之虞;而在战后和平发展的时机下,如何为海峡两岸的中国缔造一个光明的前途,遂成为最需要思考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尤其 20 世纪 80、90 年代以来的大陆思想界,开始全面讨论现代化的道路,而在此之前约二十年,随着台湾地区的经济起飞,现代化已经成为讨论热点。韦政通先生便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思想者之一。韦先生所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最主要的兴趣点是在传统思想的

现代转化方面。

韦政通先生作为思想家，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异数，他的学术思想道路充满坎坷和艰险。

先生出身苏南一个小商人家庭，童年时如果按照父亲的愿望，继承家业，依其天资，假以适当环境，或许会成为一个地方上较有实力和影响的企业家。但他不喜欢从商，竟违逆父亲的意愿，只身外出求学镇江、南京、上海，屡经周折，也没有读成一个完整的学历，而后又鬼使神差地跑到台湾去了。完全出乎意料，早期在台湾无依无傍的生活，竟然成了他学术生涯的起点。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不少在各自领域内颇有建树的学者和思想人物，千载难逢地齐聚台岛一隅，为他的学术生命提供了珍贵的营养和不竭的动力。劳思光、方东美、陈康、牟宗三、徐复观、殷海光等学人先后成为他学术生命的浇灌者，一个依靠自学的青年，有此幸运，真可谓生命中的奇遇。

先生在台湾大学旁听方东美先生的“人生哲学”、“印度哲学”课，陈康先生的“希腊哲学史”课，每两周参加一次牟宗三先生在台湾师范学院的“人文友会”，有时因缺车资，必须从火车站步行到台大和师院。“友会”是夜间举行，回到山麓的茅屋已是深夜。其间生活多次陷入绝境，有时仅赖院中木瓜充饥。依靠王船山精神的激励和陆王学说的提撕，先生度过了早期的艰困岁月。

先生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在历经数年跟随牟宗三先生的“信仰之旅”之后，越来越感觉到不满足，遂将自己置于超越师门情感，独自探险的挑战途程中。就在此时，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先生出现在先生的生活世界里。与殷海光先生的交往颇不同于和牟宗三先生的交往，“在牟先生那里，我只认识他（应该说是崇敬他），不认识自己；在殷先生那里，我认识了我自己”（王赞源《韦政通教授访问录》）。

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先生自认扮演过三种角色：学者、思想家、知识分子。“做一个学者，是我年轻时的愿望，其他两种角色，绝非当年所敢想象，而是由于不寻常的学思历程，和一些意外的人生机遇塑造而

成。”先生的著述，按照这三种角色，可分为学术、思想和社会关怀三部分。具体说，学术部分，专题研究包括“荀子研究”、“朱熹研究”、“董仲舒研究”、“孔子研究”、“毛泽东研究”等，通史撰述包括《中国思想史》、《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体现学术通俗化的著作包括《中国文化概论》、《先秦七大哲学家》、《中国的智慧》等；思想部分，儒家思想批判著作包括《传统的透视》、《儒家与现代化》、《中国哲学思想批判》、《儒家与现代中国》、“儒家在台湾经验中的角色”的系列文章等，从传统到现代的思想探索著作包括“以传统批判现代化”系列论文、《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反思》等，现代伦理道德问题探索著作包括《伦理思想的突破》、“当代伦理诊断与重建”系列论文；社会关怀部分，包括有关知识分子、台湾政治与文化、中国未来的系列论文。“著述等身”，也许可以用来描述先生勤奋笔耕的量，却实在不足以概括先生蔚为大观的学术思想成就和宏博气象，不足以体现他贡献给时人和后世的活生生的智慧。

先生以学术为生命，他的治学，最重客观的精神。先生所献身的学问，是面对活生生的时代问题的学问，他总是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中西文化和中西历史，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固步自封。

先生以开放的心态，意识到“中国缺乏独立的学统，缺乏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真理，和这个根本缺陷（逻辑、知识论不发达）是密不可分的。这个缺陷不但长期延误了我国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对中国文化的重建工作，也产生了很大的阻力”。先生此种说法，一方面点出了我国知识分子仍然难于摆脱的自封心态，同时也可看作是对牟宗三先生将儒家当成学问的努力和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的再度提示。

客观的精神导引开放的心态，开放的心态推助客观的精神。先生借助对近代中国不幸遭遇的客观了解，进而再度达成了对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深切“同情”。“鸦片战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本质和中国国力的日益衰微，在这种内外交逼的情况下，使用任何外交策略，基本上都没有获胜的机会。在这期间，我们抵御外侮的条件各

方面都非常薄弱，唯一突出的现象，是出了一批杰出人才，这些人才稍早有林则徐，然后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郭嵩焘、曾纪泽，他们凭着极有限而又模糊的国际知识，在对交往对手的强度、意向缺乏资讯作为判断依据的情况下，依然要折冲樽俎于列强之间，可谓备极艰辛。”“所谓‘弱国无外交’”，“鸦片战争后，在外交上接受残酷考验的不只是少数人才，而是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以当时文化衰落、社会解体、民心涣散的中国，面对强劲无比的西方列强，“不管使用任何外交政策”，都同样避免不了一败涂地的结局(《19 世纪中国与西方》)。

古往今来，真正的大学问，总是离不开历史的责任和对现实的关怀，这一点在先生的所有文字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先生提倡为知识而知识，不是为了让大家脱离生活实际，只是为了培养知识分子独立不屈之品格，意在争取知识本身独立不倚之地位，意在追求热爱真理的新知识传统，而并不是要知识分子放弃对社会、对民族和对人类的责任。先生研习古代思想文化，并不是为了获得一个安宁的栖息场所，从而高枕无忧地安睡其中，往而不返。先生不喜空谈玄理，一言一说必求中的，中历史文化之的，中社会生活之的，中人心风俗之的，中国家民族之的，中人类命运之的。其为现代社会和人生立言的目的性随处流溢。

先生将自己的这种责任情怀称作“现实的关怀”，先生对现实的关怀是多角度、多方面的，诸如政治、伦理、教育甚至环境等问题，无不在先生的视野之内，关怀之中。这种关怀充分展现了先生对社会和人生的深挚之爱。

除了在学术、思想上所获得的重大成就之外，先生还以永不停息的追求、坚持不懈的努力，鼓荡理想，燃烧激情，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在自然生命的基础上，不断重新铸造自己，使自己的精神生命不断升级，不断放射出令人艳羡的耀目光辉。也许这才是先生最有感染力和诱惑力的成功。人的一生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其所获得的成就，归根到底都是在自然生命的基础上，创造价值生命的成功。这种成功无不在价值原则的导引下进行，无时无刻不受理想光辉的指引。点燃起理想

的火焰，让它永不熄灭，并按照它的指引前行，生命的潜能就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生命的意义就能在最大的限度内展现。先生的成功，就是理想实现的典范，先生就是一团永不熄灭的理想的火焰。

先生的著作，二十多年前开始在大陆出版。这些著作在大陆读者中引起广泛反响，不少读者意犹未尽，在不清楚联系地址的情况下仍然辗转去信求购先生的其他著作，甚至产生浓厚的研究热情。日益增加的阅读需要，使迄今为止大陆出版的上述著作已经显得难以满足。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在先生的全集目前尚不具备出版条件的情形下，我们认为在先生的全部文字中精选一部分有代表性的文章，编成一套较能反映先生思想各个面向的多卷本文集，也许是一个可解一时之急的办法。我们向先生请示，征得同意，终于有了这套文集的出版。

这部“韦政通文集”，基本的选编思路，是希望在尽量体现先生著作结构的同时，能够照顾到大陆读者希望了解先生的实际需要，所以在选材上，采取“论学”、“论世”、“评人”、“自述”的思路分卷。

《传统与现代之间》“论学”部分，列两个专题：一是“儒学新探与方法革新”，收录先生研究孔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的几篇文章以及若干讨论研究方法的文章，力图反映先生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基本主题和风格，使读者了解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面貌；二是“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收录先生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思想创造作品，包括创造性转化传统的思想和对新伦理问题的思考。

《人文主义的力量》为“论世”部分，列三个专题：“巨变与传统”专题主要体现先生对时代变迁的体认；“知识分子的责任”专题意图体现先生对知识分子使命感的呼唤；“迈出五四的幽灵”专题希望呈现先生对知识分子努力方向的理解。

《时代人物各风流》为“论人”部分，重点突出对人格问题的关注。列传统人物“古典人格的光辉”、近代人物“危机时代的探路者”、当代人物“坚毅的魅力”三专题。本着薄古厚今的原则，传统人物只选取了四篇，近代人物收六篇，当代人物收九篇。

《知识人生三大调》为“自述”部分，除了收录学术自传《思想的探险》，同时收录几篇补充性的文章。为显示伦理思想在先生思想中的突出地位，并考虑到各卷篇幅大致平衡，本拟收入“论学”之卷的几篇关于伦理思想的文章和演讲，也作为“我的伦理思想”收录到了这里。本卷最后，附录了一篇概述先生学术思想的文章。

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和其他种种原因，先生还有许多精彩文字一时尚无法纳入这套文集，这是编者的遗憾，也是编者需要向广大读者致以歉意的。

编者

2008 年 5 月

古典人格的光辉

孔子的性格[①]

一　引言

这里所说的“性格”，相当于司马迁所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②]的“为人”。在西方，“为学”与“为人”可以分离，有时候分离到甚至相反的地步；在孔子，此二者是分不开的，所谓学，指的就是成德之学，或君子之学，这也是两千多年来儒家传统一贯的见解。

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是怎样的人物呢？梁启超说：“自汉以来，号称行孔教二千余年于兹矣，而皆持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为一贯之精神。故正学异端有争，今学古学有争，言考据则争师法，言性理则争道统；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寖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韩退之、欧阳永叔矣，寖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顾亭林、戴东原矣，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③]梁氏的原意，是要指出历史上这些思想家们，因思想依附于孔子，而缺乏开创性。此文作于20世纪初年，目的是要求思想的解放。他的看法是否正确，在此无法讨论。不过在他生动的陈述

---

① 编注：本文选自韦政通先生著《孔子》，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

② 《史记·孔子世家》。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台北，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3页。

中，却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即孔子其人，在历代思想家心目中，会因其不同的立场和需要，而呈现出不同的精神形貌。例如在古文家看来，孔子是一位整理古史的史学家，在今文家又变成富有革新精神的改革家。在理学家的心目中，又不免把孔子宗教化，如程子说："此圣人之神化，上下与天地同流者也。"[①]扬雄说："观乎天地，则见圣人。"[②]孔子明明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7・20)程伊川却认为"孔子则生而知也"[③]。这种宗教化的倾向，易忽略其人性化的一面。古文家、今文家对孔子的了解，虽不算错，但仅是孔子角色之一端而已。

到今天，我们要怎样了解孔子其人呢？我在《中国思想史》一书中，曾提到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西化主义者，以及稍后兴起的传统主义者，他们对孔子的了解，代表两种大不相同的形象和相反的态度。在前者，孔子成为万恶的渊薮；在后者，穆罕默德、释迦、耶稣皆为"偏至的圣贤型"，只有孔子才是"圆满的圣贤型"。"二者的目的似乎相反，态度也有明显的对立，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有意和无意之间，都把孔子神圣化、绝对化了，因为不论是功还是过，不论是伟大还是罪恶，都走向极端"。因此，我认为这两种了解孔子的态度，皆不可取。当时我觉得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培，在《伟大哲学家》中，讨论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的态度是可取的。在他的讨论中，既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基础"，又了解他们都是"独特的个体"。他把四个伟人放在同一个平面层上透视，直接从生命契入，内心有敬意，但不妨碍理智的分析；能表现客观的认知，但不妨碍主观的体验。这种态度最大的优点，是不同圣者的信徒，以及站在不同民族立场的人，都同样可以接纳[④]。

徐复观先生曾说过，以卑俗和超越两种态度，都不能了解孔子。所谓卑俗，从徐氏的一些文章，大概包括 1949 年以后大陆的一些反孔学

---

① 《论语・子张》最后一节朱注引。
② 《法言・修身》。
③ 《伊川文集》四《颜子所好何学论》。
④ 以上见韦政通：《中国思想史》，台北，大林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3—66 页。

者，和“四人帮”时的批孔，当然也包括“五四”时代的反传统主义者。所谓超越，他指的是“从形上学入手”，我想也应包括把孔子宗教化的企图。徐先生欣赏“从具体生命、生活上去接近孔子”[①]的态度，这正是我在下面要做的工作。

要为孔子写篇完整的传记，因“史有阙文”，如没有新出土的资料，已很难办到。但我们仍应感到很庆幸，一位差不多二千五百年前的人物，不但对自己性格上的优缺点，有高度的自觉，而且在学生之前能无隐讳地做自我表白与自我剖析，再加上时人对他的印象和评语，已足够使我们描绘出他那丰富而又多面的性格内涵，也使我们可以接近一位人性化的孔子。

心理学使用人格（personality）与性格（character）这两个名词，在意义上有分歧，也可以相通。在中文里，如写“孔子的人格”，似不免会偏向他作为人格典范方面去发挥，“性格”则较为中性，内涵也更为宽广，所以本章的标题用“孔子的性格”，而孔子的一些人格特质，也自然包含在其中。

二　孔子的性格

以下列举的孔子的性格，绝大部分是根据《论语》的资料，以类相从而得，《论语》以外的资料也有采用，但很少。至于类别的标题，是否确当，这自然是见仁见智，有兴趣的作者或读者，不妨就自己的了解与体会，重新设计、组合，无论如何，这种方式是值得尝试的。

（一）自我期许极高

如用心理学的术语，就是成就的动机很强。孔子虽是没落贵族的后裔，但自幼家境贫寒，只有一位年少的母亲与他相依为命。他于儿

① 徐复观杂文：《论中共》，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1980 年版，第 303 页。